

在臺「雙十歲月」中的一些往事

我一生中有三個主要居住地區：最早在中國大陸住過十五年，其次是在臺灣不到十一個年頭，最後在美國卻已逾四十九年之久。

民國卅八年（一九四九）元月初，我自溫州抵臺北，那時我初中剛畢業，時年十五。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初，我離臺來美留學，總計在臺剛好有十年十個月之久，所以我稱其為在臺「雙十歲月」；它是我一生三個主要居住地區中，時間最短的一個，那裡也有很多令我難忘的重要往事，現在我想追憶一些。

成功中學的第一學期

我剛到臺灣，是國共內戰，政局動蕩，國軍節節敗退之時，亦正是陳誠（一八九八至一九六五）臨危受命，出任臺灣省主席的時候；他的任期是從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廿一日。陳主席為了安頓從大陸剛來臺北的許多學生，教育廳特令臺北市的省立建國中學，師院附中（現在的師大附中），成功中學，北一女（現在的北一女高），北二女（現在的中山女高），舉辦聯合招收高中部的學生，由師院附中主辦。在我記憶中，這是該五校僅有的一次招收春季班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進了成功中學高一。校長是何敬燁先生，他是臺灣光復後的成功中學首任校長。

那天我在附中看到榜上有我的名字之後，同時又見到一張大佈告，其內容是，凡是參加這次招生考試，而榜上無名的考生，希至教務處登記分發就讀。原來這是當時省府的政策，全體錄取，依考生住家地址，分發到這五校中較近的一所學校入學。當年這五個省中破例招收春季班，而且全部錄取，這確實是政府的一項好措施，否則會有許多青年學子無學可上，在家遊手好閒，有可能造成社會問題。

我家裡一向都是說溫州家鄉話。初到臺灣時，我祇會講溫州話，普通話既不會說，亦聽不懂。在成功中學的頭一學期，我有語言上的困難；上國文課時老師心血來潮，會叫同學站起來唸一段課文，我總是提心吊膽怕被叫到，果然有過一次出洋相的經驗。最奇怪，又意外的是，上地理課時，老師居然亦叫同學起來唸課文，坐在第一排的我，當然避不過被叫到的機會；記得當時我起來唸地理課文時，其難堪的感受與心中充滿著悶氣的程度，遠超過唸國文的課文，那副窘態，至今仍令我忘不了。

放學前，訓導主任李季先生有時會集合全校同學講話，我總是聽得一知半解，又擔心漏掉他交代的注意事項。心中認為凡是校方的任何重要宣佈或規定，除口頭之外，一定亦會出佈告，讓同學們知道；所以，我每天勤看學校的佈告欄，以彌補我語言上的困難。這個自我補救的辦法，果然幫上了忙。就這樣過了一學期，我再也沒有語言上的困難了。所以，我講的普通話是道道地地在臺灣學會的。

巷子裡的叫賣聲

一九四九年是政府播遷與大陸各地同胞紛紛來臺的一年。中央日報亦開始在臺北發行。每天清晨，徒步去濟南路成功中學上學時，在我家新生南路一段一〇三巷的巷子裡，我一定會遇上各類以叫賣為生的人，他們都是來自大陸，騎著自行車，精神抖擻，有的是高聲喊賣當天的報紙：「中央日報，新生報」；有的是用上海話，邊騎邊喊：「上海帶來的甜酒釀」；也有的是山東腔，叫著賣：「山東熱饅頭，熱饅頭」。有的叫賣不是在清晨出現，所以我祇能在禮拜天才會遇到，例如本地人，手推著車子，緩緩地邊走邊用臺語喊著：「賣酒瓶嗎？破紙新聞紙有人賣嗎？」這些各式各樣的叫賣聲，不論是普通話，上海話，山東話，和臺語，我聽慣了，久而久之，很自然地統學會了，亦能將他們的抑揚頓挫琅琅上口。

那些形形式式巷子裡的叫賣聲，是反應出當年臺灣的經濟和社會狀況的一角，歷經了已有半個多世紀，仍然不時彷彿縈繞在我的耳際，會引起我對在臺初期的一陣思念。撫今思昔，感慨系之！

閱讀新聞報

我在溫州唸建華初中時，學校沒有圖書室，更沒有任何報紙供學生閱讀。民國卅六年（一九四七）上初二時，大概是二月間的一個禮拜天，上街遇到一個貼有「溫州日報」的報欄，我好奇地停下來，瀏覽一下當天的日報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新聞報，引發了我的興趣。從那以後，在校午餐後，我有時會進老師休息室去看報。記得同年，臺灣的二二八事件發生，我就是老師休息室從三月一日（星期六）的「溫州日報」上獲知的。

一九五〇年代前後，臺北市的中正路（即現在的忠孝西路）和中山南路一段相交的圓環處，在監察院的左對方，沿著中山南路一段的人行道旁，有一長排新聞報欄，上面貼有好多家當天的報紙，例如中央日報，新生報，公

論報，中華日報等，免費供市民閱讀。

我到了臺北，家裡沒有訂任何新聞報紙，亦無收音機；當時的成功中學雖有圖書室，但很簡陋，也沒有一份報紙。我祇好利用禮拜天的上午，功課做完了，如無家事，天又不下雨，就從家徒步越過新生南路，走上濟南路，往中山南路一段方向，去監察院左對方的那個新聞報欄看報。我所喜歡看的多半是屬於國家大事和國際方面的新聞，以及一些社論，看完一份報，再看另一份報，有時甚至於看完所有貼在那裡的報，頗有興趣；我每次閱罷，總是懷著一份滿足感，喜悅地從原路回家。

在那裡看免費報的人，不是祇有我一個人，每次必定有三至五個人，而且均是不同的男性；在我記憶中，好像未遇見過比我年輕的。高中的三年期間，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獲知國內外的重要新聞。

來美後，每次回到臺北時，如車子經過監察院附近，我很自然地在車裡，會張望一下當年我常去閱報的那個拐角地方。年代已久，當然絲毫找不到老去的影子，說不一定當年曾在那裡閱過報的人，有的或許早已不在人間了。世事的無常，免不了令人感傷！

暑期軍中服務

一九五〇年代，軍中服務是臺灣大專學生的一項重要暑期活動。在救國團的安排下，紛紛組團去各地，包括外島的金馬，為軍中戰士展開服務和慰問的工作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（一九五四）暑期，我應同寢室的張廷璜（電機系）相邀，報名參加臺大的「馬祖軍中服務隊」。該隊是由歷史系三年級的幾位學長所發起的，他們是楊培桂（隊長），盧荷生，陶基強，王民信，錢同曾（女）。總共約有二十多位隊員，其中大概有五、六位女同學。

在出發前，大家一起在臺大教室排練一些節目，如歌唱，舞蹈之類。老實話，這兩樣我都不喜歡，尤其是舞蹈，對我而言，它是屬於「免談」的一項。於是我參加歌唱，因為可以隨著大家一起唱，不易顯醜。負責指導我們唱歌的是王民信，他教了不少歌曲，其中有高山青，綠島小夜曲，玉門出塞，松花江上，茉莉花，康定情歌，鳳陽花鼓，長城謠，滿江紅等十幾首名歌，再加上一些反共愛國歌曲。其實有的歌大家早已會唱，祇是再複練一下。

我們是搭海軍軍艦，從基隆開往馬祖。馬祖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島嶼，其中以南竿，北竿和高登為主。當年在馬祖的各島嶼上是很難得見到一顆樹，居民均十分貧困，無公路，島上交通甚不方便，又缺乏資訊，可以說是相當落後，荒涼，貧瘠的外島地區。

在中共「八一建軍節」的前夕和當天，馬祖軍民確實提高警覺，緊張了一下，準備應付可能發生的炮戰，所幸兩岸平靜無事。我們體驗到了戰地的備戰氣氛，是難得的機會。

女生在那裡洗澡很不方便，她們需要一個很隱蔽的處所，但往往那裡都是沒有門的，所以有部分男生會去為她們服務站崗，一直到她們全體浴罷整裝出來，站崗的男生們才算「達成任務」，「安全返防」。

我們在馬祖勞軍服務有兩個禮拜，幾乎訪問過每個排或連的駐紮地，所有的官兵似乎是清一色大陸人，沒有一個臺灣同胞。他們的任務是防禦，生活很單調，無資訊，不但不曉得臺灣的近況，更不知國際現勢。

有一天，一位戰士臉上顯著有所渴望的表情，向我探問：「最近臺灣有些什麼新聞？我們都很想知道。」經這意外的提問，我欣然地將這次來馬祖以前，從臺北各報紙所刊登的新聞中，把還記得的一些，敘述給他們聽，還加上一些我自己粗淺的看法和分析，竟然使他們聽得很起勁，令我有意外收穫的感覺；真沒想到，我平日注意新聞報導，這次卻派上用場了。翌日開始，我從行李袋中檢出所帶來那幾份剛過時的中央日報和新生報，隨身攜帶著，不再參加為戰士們事先安排的團體歌唱活動，由我擔任時事報導和社論分析的工作，一直到服務結束為止。

其實，我也沒有資格談任何新聞或政治的評論，但我對比較有興趣，比起唱歌跳舞要好太多了；同時這祇不過是當年在「文化沙漠」的外島，臨陣客串，為戰士們服務一下而已。但他們那種專心聽講的神態，加上偶爾的發問，卻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。

「高山青，澗水藍，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，阿里山的少年壯如山……」這麼多年來，每當我聽到這首熟悉又動聽的「高山青」歌曲時，就會回想起當年參加馬祖軍中服務的一些點滴。

歷經五十多年的不斷建設，據報導馬祖已由過去的「文化沙漠」，變成為目前的「海上花園」，一切均已達到現代化了。

臺北申一紡織廠

我在臺大機械系四年級時（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），紡織工程是選修課之一。劉文騰博士（一九〇七年生）是當年臺北申一紡織公司的總經理，安徽人，留英的紡織工程博士，在臺大是兼任教授。我選修了這門課。

畢業後，我接受第五期空軍預備軍官訓練，一九五八年一月服役期滿退伍。我生長的家庭是既無政商關係，又不識達官顯要；爲了就業要找工作，真是不知從何著手。

正在憂慮之際，靈機一動，我想到了劉老師，心想或許申一紡織廠可能有雇新人的機會。於是有一天，約上午九點鐘，我鼓起勇氣去他府上拜訪。運氣不錯，他在家，還親自出來開門。經自我介紹後，並說明剛退役，需要找工作，不知老師能否替我推薦工作。他很和藹的問我：「你在臺大選我的紡織工程課成績如何？」我回答說：「我記得是八十八分。」他滿臉笑容，立刻對我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，明天上午十一點鐘，你到懷寧街申一公司來看我。」就這樣結束那天的拜訪，我向劉老師道謝，鞠躬告辭。

次日我依約，按時到達申一公司，在劉老師的辦公室裡，我坐在他對面，看著他提筆寫了一張便條，派我擔任申一紡織廠織布部門的保全（即織布機的維護）工程師，先見習三個月。劉老師寫完後，吩咐我：「在一週內，憑這張便條去廠裡報到上班，你必須在廠裡吃住，上日夜班方便一點，可能會很辛勞，但年輕人應該沒有問題；在廠裡要注意安全，聽從廠長的指導，多向同事虛心請教學習，這樣才會有進步。」當時，我有如中了愛國獎券似的興奮與喜悅的心情，在道謝聲中，恭敬地從劉老師手裡，接過來他的任用便條。

在人浮於事的當年，我能這麼意外，順利地找到了步入社會的首項工作，而且又是一份待遇較爲優厚的職務，實屬不易，難能可貴。雙親得此佳音，亦喜出望外。倆老都異口同聲對我說：「你全靠這位劉老師，要記得他。」劉老師任用我的那天教誨，還有雙親的囑咐，我到今天都還牢記在心！

我向設在臺北松山的申一廠報到後，始知我的同班同學朱亦明也已被錄用。他是分派到紡紗部門工作；他比我晚幾天報到，跟我住同一房間。廠裡有三位臺大機械系學長，陳耀漢（高我五屆），謝榮芳（高我三屆），王正一（高我兩屆）。他們對朱亦明和我都很照顧愛護，使我倆很快就對廠裡的情形有所了解，受惠良多；謝與王兩位學長均係臺籍，可見劉老師用人是沒有考慮省籍的。

申一紡織公司的董事長是王雲程先生，他常在香港，偶爾來臺公幹。我們大家在背後都稱王董事長為老大，稱劉總經理為老二。大家對這兩位都很敬畏，廠裡祇要聽說其中一位或同時蒞臨，全廠緊張萬分的程度，有如蔣公總統生前要到部隊裡校閱一樣。

一九五九年春，朱亦明和我都去報考教育部舉辦的留學考試，我們均考上了。當時的教育部長是梅貽琦先生（一八八九至一九六二）。同年十月中，我辦妥留學的一切手續後，正式向申一公司請辭。劉老師在辦公室接見我時心情很好，記得當時他是這麼對我說的：「謝謝你在申一服務了一年八個月，現在有志赴美深造是件好事，我為你高興；將來學成回臺，如果還願意來申一，我們會很歡迎你的；所以在你的辭呈上，我批的是留職停薪。」我的答詞是：「十分感謝老師去年二月雇用了我，這是我進入社會的第一個工作，是一項難忘的職務，我在此獲得了不少紡織工程方面實際的知識與經驗，同時亦解決了我赴美深造所需之旅費。老師，我永遠感恩在心。」那天他還親自送我下樓，一直到公司的大門口，我才向老師拜別。

一九七五年夏，我應邀回臺北參加國家建設會議時，曾和內人伯玲特地去拜訪劉老師，約十六年不見了，看起來他還是很健康；他抽空請我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，我向老師簡報留美期間的情形；席間，他很懇懇的要我們多吃一點鱻魚，它是這家餐館的名菜，還說在美國是不易吃到的；親切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沒有想到那一天的午餐，竟是他辭世前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。我很榮幸，一生中有好幾位相助過我的貴人，劉老師就是其中的一位，我永遠感念著他。

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於馬州